

# 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

陈东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日本学者在汉语训诂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大学中文专业任教三年的体会,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训诂学研究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训诂学;汉语史;日本汉学;中日交流

**中图分类号:**G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1-0086-06

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大学中文专业任教三年,以及多次参加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语学会、日本中国近世语学会年会的体会,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训诂学(以下简称训诂学)研究的积极作用。

第一,除了中国本土之外,日本的汉语史研究者是世界上最多的,约有数百人(其中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的约有100余人)。他们基本上在各所大学从事汉语教学,但他们研究的内容几乎涉及汉语史研究的所有领域,在音韵学、方言学、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和语法、佛经词汇、古文字学以及中日汉字词比较等方面均有突出的成绩,乃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学者关于汉语训诂学研究的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关西大学、花园大学、南山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等是日本训诂学研究者较为集中的大学,科研成果较多,水平较高。

日本的训诂学研究者十分注重研究的基本工作。在从事某一项研究之前,他们常常亲自动手编制索引、目录、资料汇编等工具书,太田辰夫、波多野太郎、入矢义高等德高望重的日本训诂学家都编过这类工具书。在研究风格上,日本学者重考证,重视细小及别人不太注意的问题,并在论著中注重列举大量的材料来说明问题,颇有乾嘉遗风。有时在中国学者看来很小的一个论题,日本学者也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专著。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日本训诂学研究者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的不少优良传统,但是他们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他们普遍重视对外交流,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韩国以及欧美等地出版的汉学论著十分关注,信息灵通,加上经济条件远较中国内地学者优裕,所以有条件大量购买此类书籍,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论著几乎竭泽而渔。同时,他们一年中可多次去国外,或合作研究,或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或查阅图书资料。此外,许多日本训诂学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还掌握多国外语。笔者在日本任教期间,曾接触过多位青年训诂学研究者,他们除了精通汉语之外,还掌握英、法、德、韩、俄、西班牙等国语言中的一门或数门。上述种种,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促进了日本训诂学研究的发展。

日本学者在训诂学(尤其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领域成绩卓著。香坂顺一、入矢义高、波多野太郎堪称这一领域的泰斗。香坂顺一长期致力于明清时期汉语词汇的研究,《白话语汇の研究》<sup>①</sup>、《水浒传语汇の研究》、《〈水浒〉语汇と现代语》收录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水浒传语汇の研究》乃其多年研究近代汉语的力作之一,对《水浒传》中的600多个虚词逐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科学的分类、细致的描写、简洁的历史比较,分为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助词五个部分。该书参照《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广泛吸取了中国、日本汉语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近代汉语理论著作。此外,该书还可以作为近代汉语虚词工具书来使用,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水浒〉语汇と现代语》则联系现代汉语,对《水浒传》中的实词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作了简洁的历史比较,以揭示出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实词的演变规律,

收稿日期:2004-10-22

作者简介:陈东辉(1966—),男,浙江绍兴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汉语史、清代学术文化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① 本文在论及日本学者的有关训诂学论著时,凡遇到书名或篇名中的の、と等简单明了的日语假名时,根据原文照录;遇到较为难懂的日语时,则译成汉语。书名或篇名中的汉字,一律依照中国简化字书写。

在词汇史研究方法论上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香坂顺一还于1961年组织了清末文学言语研究会(1962年改称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发行会刊,并连载《近世语札记》。这个研究会后来发展为日本中国近世语学会<sup>①</sup>,如今拥有会员百余人,每年举办一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刊《中国语研究》,成为日本两大汉语研究团体之一(另一个是日本中国语学会),为日本近代汉语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波多野太郎曾任日本中国语学会理事长。他曾在《横滨市立大学论丛》上连载《中国小说戏曲语汇研究提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编了大量与训诂学研究有关的资料丛刊和索引等工具书。他所编的《白话虚词研究资料丛刊》,收录江户时代以来日人编纂的诠释中国小说、戏曲、诗歌中的白话虚词的著作。同时,他还编有《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文学语学资料集成》、《中国方志所见方言汇编》、《吴下方言考索引》等。此外,他于1960年发表的《增订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后》一文,高度评价了蒋礼鸿所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称颂该书是“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指路明灯”。

入矢义高亦系近代汉语研究的权威学者,其成果以单篇论文和译注为主。他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发表过《关于近代俗语辞典编纂的资料》等论文。他有《洛阳伽蓝记》等译注,另外还编过《〈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等。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和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撰写的书评,曾经在日本和中国训诂学研究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日本中青年一代的学者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在训诂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佐藤晴彦主要从事近代汉语的研究,尤其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三言》中的哪些作品为冯梦龙的创作。他将最普通的常用词汇、语法作为断代的标准,而不是以很难懂的特殊词汇作为断代的标准。因为他认为特殊词汇数量少,而且容易被有意地模仿。这是很有见地的,值得训诂学研究者思考。

此外,森野繁夫编纂的《六朝古小说语汇集》、星斌夫编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语汇》和《中国社会经济史语汇续编》、日本宋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语汇研究班编纂的《明清时代社会经济语汇索引》等专门词汇集,对训诂学亦颇有用处。

第二,由于日语在词汇、音韵、文字诸方面都深受汉语的影响,因此通过比较等手段研究汉语和日语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解决训诂学研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日语中的汉语词汇大多源自汉语,有些尚保留着中古近代汉语的词义及词形,但因为年代久远,有不少词汇之源流以及确切含义却往往不为人所察。如“退婴”一词,《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大辞典》等均未收录,《汉语大词典》收有该词,释义如下:语出《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王弼注:“专,任也。致,极也。言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婴,一本作“樱”。后以“退婴”谓像婴儿一样柔弱无争。含贬义。鲁迅《集外集拾遗·〈新俄画选〉小引》:“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所以后来,艺术遂见衰落。”聂绀弩《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别的革命者的思想,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境界,时过境迁,就褪色,退婴,乃至消失。”<sup>②</sup>岑麒祥《汉语外来词词典》则认为“退婴”一词源出日语,系“退缩、保守”之义。“退婴”在日语中属常用词,任何一种日本国语辞典或日汉词典均予收列。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将“退婴”释为“倒退,闭居不出,毫无积极进取之心”。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专门对“婴”字作了解释:围绕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出其外。《新明解国语辞典》注明“婴”之义为“守”。据此,“退婴”之“婴”并非指“婴儿”,而应该是动词,意为“环绕”或“保守”。但实际上“退婴”并非日人据汉语之义创造的和制汉语,而是至迟出现于宋代的汉语词汇。范浚《香溪集·徐忠壮传》云:“徽言拥帐下士,决命战门中,几百遇,所格杀甚众,左右死伤亦略尽。退婴牙城以守,敌攻不已,众蚁登。”<sup>③</sup>此乃“退婴”之词源所在。“退婴”之“婴”实为“婴城”之略,乃“以城自绕”之谓。又由于“婴城”之意在乎“守”,故“退婴”之“婴”之“婴”尚可理解为“婴守”。<sup>④</sup>

第三,《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倭名类聚抄》、《类聚名义抄》、《倭玉篇》等日本古辞书,《大汉和辞典》、《汉字语源辞典》、《广汉和辞典》、《〈学研〉汉和大字典》、《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字の字典》、《今昔文字镜》等日本近现代辞书,以及《明清俗语辞书集成》、《唐话辞书类集》等,对于训诂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篆隶万象名义》系日本弘法大师空海根据顾野王《玉篇》而编撰的,乃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学的珍贵资料。今本《大广益会玉篇》与日本所藏唐写本原本《玉篇》残卷(仅存原书的1/8左右)已相距甚远,而《篆隶万象名义》所撰之书分部列字的情况与《玉篇》残卷相合,所收16900多字也同顾野王《玉

① 日本所谓的中国近世语或近代汉语,是指明清时期的汉语,与中国学术界所谓的近代汉语的概念有所不同。

② 参见《汉语大词典》第10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845页。

③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第171页。

④ 参见何华珍《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3—229页。

篇》相当，注文中训释文字的义项也基本相同，只是删去了原书所引经传及顾野王按语。此外在部分正文之上增加了篆书。编排体例与《玉篇》一致，均分为30卷，依542部编次，始一而终亥。《篆隶万象名义》作为日人所撰的汉语中古字书，为后人窥见顾野王《玉篇》之原貌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篆隶万象名义》注释文字保留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其反切记录了南北朝时期的语音状况，在音韵学上很有价值。其义训比《大广益会玉篇》丰富得多，在训诂学上亦颇有意义。诚如杨守敬所云：“若据此书校刻饬世，非唯出《广益玉篇》上，直当一部顾氏原本《玉篇》可矣。唯钞此书者草率之极，夺误满纸，此则不能不有待深于小学者理董焉。”<sup>①</sup>《篆隶万象名义》和《原本玉篇残卷》<sup>②</sup>均系日藏唐代传写本，字形大同小异，其中有大量相同的俗体、讹字，有助于考究写卷文字。在这一方面，《篆隶万象名义》与《龙龕手鏡》颇有相似之处。其中又有些文字同上古先秦文字密切相关相承，于隶古定字亦有助益。再则，该书对于研究汉字流变具有重要价值。《篆隶万象名义》只有日本山城国高山寺所藏鸟羽永久二年（1114）之传写本，日本崇文院于1927年据以影印，收入《崇文丛书》第一辑。中华书局于1995年依据《崇文丛书》本缩印出版后，《篆隶万象名义》已经逐步引起中国国内学者的重视，但无论是对该书的研究还是利用，都还远远不够。

《新撰字鏡》的编撰年代推定为平安朝初期，即昌泰年间（898—901）。编撰者昌住乃南部学僧。现存本是1124年十二卷抄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完本。该书自“天部”至“连部”共计160部，凡20,940余字。该书分部不按《说文》、《玉篇》之顺序，而是依部首编排，同一部首内再根据“天象”、“人事”、“自然动植物”等分类，其中一部分又以四声排列，导致体例不够统一。该书之注解收集义训甚夥，其义训大多来自玄应《一切经音义》、《玉篇》和《切韵》，同时还旁采诸字书以增益之，此外尚有少量日本义训。“今为勘之，其正、俗等字有出于《集韵》、《龙龕手鑑》之外者。所列古文，亦有出于《说文》、《玉篇》之外者。盖昌住当日本右文之时，多见古小学书，（观《见在书目》可证）不第《玉篇》、《切韵》皆顾、陆原本也。”<sup>③</sup>《新撰字鏡》以及释源顺的《倭名类聚抄》（约成书于931—938年）、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钞》（成书于991年）、释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成书于1235年）等，均采用了《玉篇》的释义，对研究《玉篇》颇有价值。

具平亲王编撰的《弘决外典钞》除了采用《玉篇》的释义外，还引用了《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顾恺之《启蒙记通玄》、贾大隐《老子疏》、周弘正《庄子疏》、刘炫《孝经述议》等罕见中国古籍的资料，值得重视。释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中的“三部经”是指《无量寿观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该书所引的《东宫切韵》（早已亡佚）载有曹宪、陆法言、孙愐、王仁煦、麻果、薛峒、郭知玄、祝尚丘、孙旰、韩知十、武玄之、裴务齐、沙门清彻等之说，弥足珍贵。

影响甚大的《倭名类聚抄》（又名《和名类聚抄》，简称《倭名抄》或《顺倭名》）系汉学家释源顺在承平年间（931—938）编成。该书以汉字立条目，采用天、地、水、岁、时等部首分类，同一个“部”内又分“门”，所以称作“类聚”。书中的每个词条除了注音、释义以外，还附有出处。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入了为数不少的俗语词、口语词。

《类聚名义抄》乃成书于11、12世纪的汉日词典，系法相宗学僧所撰。书名中的“类聚”和“名义”系参照《倭名类聚抄》和《篆隶万象名义》，部首分类则基本上根据《玉篇》。该书收录汉字的正体和俗体，并将和训注于其下。各部之下，名义可以相附者，即汇入其中，在这方面有点像类书。《类聚名义抄》“虽稍涉庞杂，然古文奇字赖之以考见者正复不少，固不得以《说文》等书律之也”<sup>④</sup>。名古屋女子大学原教授草川升所编的《五本对照类聚名义抄和训集成》，已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全书共分4卷，收录图书寮本、观智院本、莲成院本（镇国守国神社藏本）、高山寺本、西念寺本等5种版本的《类聚名义抄》中的和训，共计63,661条。该书对于中古汉语音韵及词汇等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倭玉篇》系《倭译大广益会玉篇》之简称，研究者对其成书年代有不同看法，大多依据现存最古本推定为延德三年（1491），也就是室町时代初期。《倭玉篇》在当时的日汉词典中具有代表性。其词条根据《玉篇》的部首排列。由于版本不同，最多的分为542部，最少的仅有100部。词条注释采用“训读法”，收入了大量流行语，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前词典中“训读”不足部分。北恭昭所编的《倭玉篇五本和训集成》，已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该书共计3册，其中《本文篇》1册，收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室町中期写本《拾篇目集》、大东急纪念文库藏享禄五年（1532）写本《玉篇略》、米泽市立图书馆藏室町后期写本《倭玉篇》、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弘治二年（1556）写本《倭玉篇》、大东急纪念文库藏大永四年（1524）

① 《日本访书志》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② 中华书局，1985年。

③ 《日本访书志》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④ 《日本访书志》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写本《玉篇要略集》等5种不同版本的《倭玉篇》，另有《索引篇》分上、下两册，乃详细的和训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日本近现代文献学泰斗长泽规矩也所编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sup>①</sup>，系从日本公私度藏的中国古籍中精选有关书籍二十种汇编而成，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参考书。《集成》所收的各种刻本中，有稀见的善本，即使属晚清刻本，亦大多是流传不广的私家刻本或仿刻本，明清以降的版本目录书中也罕见著录。为了使国内有关学者有机会利用这部极有价值的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影印出版了该书。在影印之前，对其中佚名的明刊本《目前集》，觅得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明赵南星撰《味槩斋遗书》，此书系清光绪中高邑赵氏刊本，其中《目前集》的卷目及版本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一致，盖光绪时用明旧雕版重印，上海古籍版乃据以补齐《题词》和残页，对版面不清者亦大多予以更换。同时，又据《中国丛书综录》多处著录及《味槩斋遗书》，确认《目前集》作者系明人赵南星。再则，《通俗常言疏证》亦以较清晰的同一版本对各卷文字模糊者抽换60余页。它如《里语征实》、《直语补正》等书的个别地方，也参照同类藏本作修补。此外，为了便于查检，书后增附了四角号码索引。笔者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汲古书院版《明清俗语辞书集成》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的训诂学研究资料通过交流，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相得益彰、同受沾溉，其促进双方训诂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之功为两国学人所共庆。

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唐话学”（“唐话”即当时的汉语）发展很快，学习及研究汉语的人甚多，出现了一大批汉语辞书及读本、课本。这些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俗语、方言等情况，乃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资料。日本古典研究会编、长泽规矩也解题的《唐话辞书类集》<sup>②</sup>，集中收录了这类书籍，其中包括不少写本及稀见本。《唐话辞书类集》分为20集，收录《唐话类纂》、《胡言汉语》、《怯里马赤》、《语录译义》、《唐话为文笺》、《忠义水浒传解》、《忠义水浒传抄译》、《忠义水浒传钞译》、《水浒传批评解》、《而言解》、《色香歌》、《剧语审译》、《唐人问书》、《崎港闻见录》、《南山考讲记》、《常话方言》、《唐话纂要六卷》、《唐音雅谷语类五卷》、《唐译便览五卷》、《唐话便用六卷》、《两国译通》、《唐音和解》、《唐音世语》、《语录字义》、《宗门方语》、《碧严录方语解》、《八仙卓燕式记》、《徒杠字汇》、《俗语解》、《俗语解》（静嘉堂本）、《明律考》、《应氏六帖》、《水浒传译解》、《忠义水浒传（语解）》、《忠义水浒传（语释）》、《水浒传字汇外集》、《公武官职称名考》、《词略》、《奇字抄录》、《杂纂译解》、《字海便览》、《小说字汇》、《训义抄录》、《支那小说字解》、《中夏俗语藪》、《汉字和训》、《授幼难字训》、《学语编》、《粗幼略记》、《华语详译》、《官府文字译义》、《俗语译义》、《游焉社常谈》、《华学圈套》、《（崎阳照照子先生）译通类略》、《译通类略》、《译官杂字簿》、《满汉琐语》、《杂字类译》、《中华十五省》、《译家必备》、《水浒传记闻》、《水浒传记抄解》等63部辞书，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很大便利。

木村晟所编的《古辞书研究资料丛刊》，已由日本大空社出版。该《丛刊》共分31卷，收录《聚分韵略》、《平他字类抄》、《文凤抄》（含古写本二种）、《色叶字平它》、《色叶集》、《伊露葩字》、《新韵集》、《和训押韵》、《韵字记》、《汉和三五韵》、《和汉新撰下学集》、《法花文句难字书》、《法华经文字声韵音训篇集》、《新撰类聚往来》、《延命字学集》、《节用残简》、《快言抄》、《（雅言俗语）俳谐翌桧》、《假名文字遣》（含天正六年写本和无刊记本）、《运步色叶集》、《日本一鉴》、《方言类释》、《幼学指南抄》、《类字源语抄》、《续源语类字抄》、《古节用篇（和名集）》、《北野天满宫藏佚名古辞书》、《万叶类叶抄》、《连歌至宝抄》、《要略字类抄》、《略韵》、《童蒙颂韵》、《伊吕波韵》、《和语韵略》、《和歌初学抄》、《八云御抄》、《藻盐草》、《国籍类书字书》、《字书（名汇）》、《词叶新雅》等41种日本珍贵古辞书，对于训诂学研究者而言也是难得的参考文献。

日本现当代所编的汉和词典中，规模最大的当推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sup>③</sup>。该书收单字48,900个（连补遗为49,964个），附有篆文10,100个，词语526,500条，收录插图2,800幅。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但加收了中国古代其它字书的字和一些日本国字。该书的编排是以单字带复词、成语，单字按部首排列，其下复词以日语五十音顺为序。附有笔画、字音（按日文音序排列）、字训（按日文字义排列）和四角号码等4种索引。该书的字形以《康熙字典》为依据，并参考《说文解字》、《尔雅》、《玉篇》、《字汇》、《正字通》等古代字书，然后作出统一的决定。揭示篆书，慎重究明六书之本义。字义解释以平易确切为主，明标出处，举应用实例，并究明音义通用文字的相互关系。同一文字有异体、俗体者亦加列举。单字的注音包括日语假名、汉语注音符号、拉丁字母拼音，并标注声调和《集韵》等韵书的反切以及韵部；有

① 日本汲古书院，1974年。

② 日本汲古书院，1971—1976版。

③ 日本大修馆书店1955—1960年版，精装12册，附索引1册。1966—1968年出缩印本；1974年出修订本；1984—1986年出最新修订本。2000年又出版了《大汉和辞典补卷》。另有1990年出版的《大汉和辞典语汇索引》。

几种音义的字，注音分列几项，和释义相对应。字头之下还列有小篆、古文等书体。此外有“名乘”、“解字”和“参考”诸项。“名乘”项专门注明该汉字用作日本人名时的特殊读法。“解字”项主要说明象形、指示、会意三种字的结构和本义，并阐述各种引申义发生的经过。“参考”项说明字形、字音、字义的疑义或异说等，除了补充本字释义之未尽，还举出字形类似易误的字，并辨其异同。该书乃目前规模最大的以汉文为主的大辞典，虽用日文解释，但它以汉字为词头，征引材料主要来自中国古籍，故可作为汉语词典使用。该书征引资料广博，收录了大量一般辞书查不到的字词，包括人名、别号、地名、年号、官名、书名、称谓、成语、典故、格言、俗语以及普通词语、专科术语等等，在训诂学研究中十分有用。编纂《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时，均将《大汉和辞典》列为重要参考书之一。当然，该书在征引材料等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四，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非常重视，结合有关学术研究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世界各地所出版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80%，仅唐代文学古籍索引就达38种，其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果。

日本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门类繁多，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许多索引对训诂学研究帮助甚大，如斯波六郎等编制的《文选索引》、太田辰夫编制的《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饭田吉郎编制的《元曲常用语汇索引》和《董西厢语汇引得》、东京文理大学汉文学第二研究室编制的《还魂记语汇引得》、太田辰夫编制的《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语汇索引》、古屋二夫编制的《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语汇索引》、鸟居久靖编制的《瓶外卮言语汇索引》和《古谣谚语汇索引》（合编）、佐藤仁编制的《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汇索引》、盐见邦彦编制的《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西冈弘编制的《游仙窟索引》、大岛伸太郎编制的《妙法莲华经索引》、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编制的《法华经一字索引》<sup>①</sup>和《维摩诘经·胜鬘经一字索引》、柳田圣山编制的《祖堂集索引》、太田辰夫编制的《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山田孝雄编制的《玄应一切经音义索引》、神尾壹春编制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索引》、山田利明等编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语汇索引》、藤田至善编制的《后汉书语汇集成》、小野川秀美编制的《金史语汇集成》、田村实造编制的《元史语汇集成》等。波多野太郎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亦功绩卓著。他编制的《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综合索引篇》，是对在日本德川时代、明治年间到昭和时代编印的有关中国小说戏曲资料的语汇综合索引。该索引详注出处，检索方便，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训诂学极有用处，是一部高质量的工具书。《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1—9编）亦系波多野太郎所编。该书将中国地方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加以汇编影印，每编卷末附有该编所收方言词汇的索引。卷首有一导言，叙述方志中所录方言词汇的语言学价值。该书将有关方言资料按地区汇聚地一起，并编制了索引，检索方便，故可作为一部语词索引来使用。该书对于汉语方言研究及辞书编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由日本魏书研究会编制的《魏书语汇索引》，耗时近30年，精装一巨册，采录（北齐）魏收撰《魏书》中的人名、地名、王朝名、民族名、书名等固有名词，官职、法律、仪礼等与制度有关的用语，与政治和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用语，动植物名、器物名、自然现象、人物评价等，以及属于普通名词的用语编制成索引，为中古汉语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大阪市立大学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编制了一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语汇索引，包括《红楼梦语汇索引》、《金瓶梅语汇索引》、《水浒全传语汇索引》、《儒林外史语汇索引》、《儿女英雄传语汇索引》和《中国古典戏曲语汇索引》等6种，对研究近代汉语甚有助益。它如入矢义高编制的《通俗篇·真语补证·恒言录·方言藻·尔雅综合索引》、西端幸雄编制的《玉篇零卷出典索引》和《原本玉篇零卷玉篇佚文补正汉字索引》等，均系从事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近年来出版的石川重雄编制的《宋元释语语汇索引》、川岛郁夫编制的《〈元曲选外编〉语汇索引》、渡边洋编制的《〈刘知远诸宫调〉语汇索引》、大岛吉郎《〈红楼梦〉语汇索引》和《容与堂本〈水浒传〉语汇索引》等，在从事近代汉语研究时也颇有用处。此外，日本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编制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规模宏大，乃研究佛经词汇的重要工具书。

此外，日本还出版了一些中国古籍专书词典。如辛岛静志编纂的《正法华经词典》，收入了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中佛教词、音写词、口语词等为中心的4千多条词语。在每个条目中，除了详细标明该词条出自《正法华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卷）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外，还注明了该词条的现代汉语拼音和英语翻译，在《汉语大词典》和《大汉和辞典》中的页码以及最早的书证，并且附上了梵本《正法华经》（Kern-Nanjio校刊本及中亚出土写本）以及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卷）中的对应词。此后，辛岛静志又编纂了《妙法莲华经词典》，体例与《正法华经词典》相同。作者还将继续编纂其它汉译佛典的词典，最终将它们汇总在一起，编一部以汉译佛典为材料的《佛典汉语词典》。上述带有索引性质的词典对于佛经词汇及中古汉语研究非常有用。

① 一字索引即逐字索引，日本一般称为一字索引。

第五,众所周知,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籍,内含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善本近9千种,仅唐人写本就有至少32种。<sup>①</sup>其中有不少典籍已在中土亡佚,弥足珍视。这些典籍大多直接或间接与训诂学研究有关。如晚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和杨守敬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收录了多种在中土失传已久的逸书。其中的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正体的字书,释义完备、例证丰富,词义不明的,还有顾野王按语,并赖以保存了多种亡佚已久之书,宜倍加珍视;<sup>②</sup>《韵镜》是现存韵图中最古老的一种,至今仍是音韵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此外,《古逸丛书》中还有多种日本收藏而中国罕见的隋唐写本和宋元刻本。内中的影宋蜀大字本《尔雅》,乃现存《尔雅》单注本中一个较早的本子,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覆宋本重修《广韵》和覆元泰定本《广韵》,为考究《广韵》的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在音韵学和校勘学上亦很有参考价值。

《集韵》现存三种宋刻本,一是南宋初年明州(今浙江宁波)所刊,经南宋中期修补印行的本子,是《集韵》传世最早的刊本,也是清代以来通行诸本的祖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影印出版。二是南宋孝宗时湖南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入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出版的《古逸丛书三编》中。三是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今陕西安康)军刻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该本以蜀本为底本,校之以中原旧本,并用《说文》、《尔雅》等书纠谬。由于该本深藏于日本皇宫,故中国国内学者长期以来仅能依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诸书方可窥其一斑,却少有睹其全貌者,以致对它产生种种猜测和误解。其中之一便是认为国图与宫内厅的两个本子系《集韵》的同一重刻本。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金州本和湖南本均刊刻于南宋孝宗年间,而两本行款格式又大致相同。但经过仔细考辨,可断定金州本和湖南本绝非同一版本。日本宫内厅所藏金州军刻本的价值,除了在于它是不同于通行本系统的一个详加校订的宋刻本之外,还在于它有保存完好的牒文、衔名和跋文,为后人提供了关于《集韵》一书的宝贵历史资料。它清楚地表明了《集韵》的编撰及刊刻年代,可纠《四库全书总目》之误,尚可补由于其它版本牒文残缺而造成的《集韵》成书及刊刻问题不详之遗憾。它还显示《集韵》的宋刻本除我们所知的之外,尚有蜀本、中原本等,只是与庆历原刊同样不存于世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集韵》金州军刻本已非完璧,缺首卷,仅存二至十卷。该书已收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由中国线装书局于2001年据原版缩小影印。<sup>③</sup>

此外,在日本有“和刻本”这一名词,其概念与“日本刻本”不同,一般是指日本刻印的中国汉籍。“和刻本”这一日本文献学名词在中国尚不通行。中国学界一般称此类版本为“日本本”或“东洋本”。但近年来和刻本已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王宝平主编)已由杭州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刊行,收录中国内地68家图书馆所藏日本明治年间及明治以前刻印、抄写的中国著者之书和日本著者的注校、研究中国古籍之书,大正、昭和时期的影印本亦间有收录,其中“经部·小学类”收书118种,关于《尔雅》的就有日本翻刻宋本《尔雅》三卷、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松崎氏羽泽石经山房影刻宋本《尔雅》三卷《音释》三卷《校讹》一卷(日·松崎复校编)、日本影刻清嘉庆六年(1801)南城曾氏艺学轩影宋绘图本《尔雅》三卷、日本文久二年(1862)积玉圃刻本《尔雅注疏》十一卷、日本翻刻明万历本《尔雅注疏》十一卷等5种。由于和刻本与中国本土刻本往往有所不同,因而和刻本在训诂学研究中有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但由于条件所限等种种原因,和刻本尚未受到中国训诂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 The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gether with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CHEN Dong-hui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made much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tudy of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even surpass the Chinese scholars in some fields. These achievements extraordinary merits us attention and use for reference.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positive role to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by five aspects, combine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f teaching for three years in the Chinese speciality of university in Japan.

**Key word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Sinology in Japa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① 参见严绍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朱葆华所著的《原本玉篇文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对原本《玉篇》中的合并字、新增字、异体字和常用字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乃关于原本《玉篇》研究的首部专著,从该书中可以较为充分地了解原本《玉篇》之价值。

③ 参见《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集韵》影印说明,中国线装书局,2001年。